



# 從比較探索客家 讀《東南亞客家的變貌：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》



## 東南亞客家的變貌：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

蕭新煌主編 / 中研院亞太  
區域研究中心 / 10007/446 頁  
23 公分 / 600 元 / 精裝  
ISBN 9789860285567/536

### ❁ 前言

1988 年客家「還我母語運動」以後，「客家研究」開始受到學術界重視，然而臺灣的客家「還我母語運動」可說是當時「本土化」風潮下的產物，在此背景之下，也連帶影響臺灣「客家研究」走向，基本上以臺灣在地客家族群做為研究個案，探討其語言、歷史、政治、社會與經濟等各文化層面。因此，與臺灣社會「本土化」風潮相似，臺灣「客家研究」大多學界其他領域相同，較為著重於臺灣這塊土地上的客家族群。

雖然臺灣「客家研究」的「本土化」研究浪潮風起雲湧進行著，但客家族群的生活領域並不侷限於臺灣，事實上客家族群有著「離散」全球的特色，甚至還有學者將客家族群比擬為「東方的猶太人」(注 1)，在中

廖經庭 ◎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所博士生

國與東南亞區域，均有頗多客家族群生活於此，因此近年來臺灣「客家研究」也開始將視野轉移至東南亞客家地區。

臺灣、東南亞與中國三處擁有大批客家族群聚集，是「客家研究」的極佳研究場域，但此三地「客家研究」也表現出不同研究特性，中國作為客家族群祖源地，故探討客家族群淵源歷史時，不可忽視中國這塊區域；相較之下，臺灣與東南亞有著頗為相似歷史背景，明清時期以降，因土客械鬥、太平天國或饑荒等因素，客家人紛紛遷往臺灣與東南亞二處，客家人在此二處生活已逾數百年，其生活樣貌以和中國原鄉頗為不同，故臺灣與東南亞二處則是進行客家族群「比較研究」極佳場域。

目前臺灣客家學界進行東南亞客家研究者，以蕭新煌、張維安、張翰璧與林開忠等幾位教授為主，在中央研究院蕭新煌教授主持下，這些學者前仆後繼至東南亞進行調查研究，其中以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二國為主要研究場域。而這本書便是上述幾位教授結合其他海內外客家研究學者，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臺灣客家文化中心籌備處委託，進行

「苗栗園區海外研究：東南亞客家研究先期計畫」的成果。

本書研究策略為選定主題進行切入，包括會館、產業、聚落、宗教信仰與家庭等五項研究主題，而田野調查地點涵蓋砂拉越（Sarawak）、檳城（Penang）、新山（Johor Bahru）、太平（Taiping）與新加坡等新馬有客家聚集之地，希冀透過詳盡田野調查與文獻資料，探討與剖析東南亞客家族群所經歷的社會文化變遷及其與「在地化」大趨勢的辯證關係（本書頁4）。

## ● 本書介紹

本書共計十四篇論文，除了第一篇論文〈東南亞客家的變貌：族群認同與在地化的辯證〉為蕭新煌教授進行本書研究情況說明與內容導讀外，另有十三篇論文分別從各自所關注之議題進行探討，茲將各篇論文之內容重點述敘如下：

黃賢強〈新加坡永定會館：從會議記錄和會刊看會館的演變〉一文，主要根據1940年代《永定月刊》與2000年代《永定會刊》兩種不同時代的永定會館刊物，論析永定會館隨政局和時局轉變，而自我調整會務和社會定位。其研究發現1940年代《永定月刊》，幾乎全是關於家鄉永定、閩省、和中國政治的文章。2000年代《永定會刊》仍然十分關注家鄉永定，但對於中國的政治、福建省的事務都不涉及，近年來，永定會館也配合政府的呼籲，舉辦多種多樣的華人文化活動，在傳播華人傳統價值觀方面做出努力和貢獻。

利亮時〈錫、礦家與會館：以雪蘭莪嘉應會館和檳城嘉應會館為例〉比較兩個客家會館，雪蘭莪嘉應會館，從創辦至今，一直在許多礦業大亨的嘉應先賢支持下，為會館未來的發展打下了穩固的根基；但由於嘉應州的客家人在檳城的經濟力量與人口都處於劣勢（檳城以福建人佔多數），因此同鄉對於檳城嘉應會館的支持是有限的。

黃淑玲與利亮時〈共進與分途：二戰後新馬客家會館的發展比較〉一文，比較檳城嘉應會館及新加坡應和會館兩個會館。馬來西亞建國後，政府與英殖民政府時代的華人政策，差別其實不大，對華人仍存有許多的不平等，這導致檳城嘉應會館必須負起繼續照顧族群的功能。反觀新加坡，在1965年8月9日獨立建國後，政府鼓吹國家認同與「新加坡人」的我群觀念，為了強化政府的理念與政策，政府不允許會館繼續成為族群的代表，新加坡制定政策公平對待國內各族群，設立聯絡所取代會館的聯誼功能，在政府角色強化的同時，亦等於逐步弱化會館在族群的影響力，時至今日，新加坡應和會館的功能只在族群文化發揚上扮演角色，在教育與政治上是完全退場。

王力堅〈新加坡茶陽（大埔）會館研究：以文化發展為聚焦〉一文以茶陽（大埔）會館為個案，探討該會館的沿革發展及現狀、會館的文教衛生事業、文化館、文化研究室與圖書館的創立及其意義、會館所面臨的問題及未來展望，希冀從這幾方面討論茶陽（大埔）會館的文化發展。

張曉威、吳佩珊〈馬來西亞客家聚落的



產業發展：以沙登新村為例）提到：馬來半島的華人「新村」(New Village)多屬「計畫設定的村落」，而非「自然發生的村落」，雖然在遷移過程中，墾民的方言群並未被列入考量範圍，但華人新村的成立，卻有意和無意之間令方言群的聚落固定下來，而雪蘭莪州的沙登(Serdang)新村、沙叻秀(Salak Selatan)新村、錫米山(Sungai Chua)新村的居民仍以客家人佔大多數。沙登新村多數村民習慣以客家話溝通，且也有客家信仰之一的譚公廟，故作者選擇此極具客家屬性的村落進行研究。本文透過歷史材料與口述訪談，討論沙登新村成立過程、產業經濟發展(橡膠業、錫礦業、楊桃業、製鞋業)，透過此一個案可發現馬來半島的客家聚落經濟活動是多元化的，尤其是製鞋業在過去馬來西亞客家經濟產業論述中，較少被提及，本文不僅拼湊沙登新村的歷史面貌，也點出馬來西亞客家村落的多樣性特色。

安煥然〈馬來西亞柔佛古來客家聚落〉一文，作者首先追尋柔佛古來客家聚落的歷史淵源，古來鄉區的客家聚落多屬「自然村」，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防範馬來亞共產黨勢力的擴張，便頒佈緊急法令，使當地的客家聚落變成「新村」，英殖民政府依方面「建村」，另一方面則進行焦土政策，郊區散居的華人被迫遷移至所謂的「新村」。在社團組織方面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，古來客家人已有明顯的地緣認同觀念，戰後成立古來惠州會館(1946年)的客家地緣組織；相較之下，當地的血緣組織較晚才成立，而單位也不多，古來李姓公會便是1983年才成立。如

今，士乃客家聚落從原先的河婆客家轉向區域認同，這裡只能說是一個比較多客家人居住的市鎮，卻不突顯其「客家色彩」。

陳美華有鑒於客家人移民南洋的記載文獻並不多，長期有「在歷史書寫中缺席」的現象，〈馬來西亞雪蘭莪烏魯冷岳客家聚落〉一文便試圖以雪蘭莪州烏魯冷岳縣境內的「呀吃」客家聚落為書寫個案。本文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呀吃客家人，受到中國政治風潮的影響，戰前當地受國民黨影響，戰後隨著國共從聯合抗日轉趨分裂，當地華人也分為支持國民黨與共產黨兩派。

李偉權〈家族企業接班規劃：霹靂州客家錫礦家族知興衰〉一文分析霹靂州客家錫礦產業的榮衰興滅，並以李萊生與胡曰皆兩個家族之個案研究，探討世代接班規劃及接班人培育如何影響家族企業之永續經營，而兩個個案皆顯示母親對家族企業之傳承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李偉權在文中提到：「霹靂州客家人在錫礦業叱吒風雲一世紀，但卻有如大多數家族企業一般，無法擺脫『富不過三代』的宿命。許多客家錫礦家族隨著第一代逝世後即煙消雲散，後代沒沒無聞。」(本書頁280)。不過本文兩個家族個案皆是「守成有成」的家族，較無法透過比較方法得出哪些因素是構成家族延續的因素。

在客家移民普遍「不善經商」的趨勢中，新加坡、馬來西亞典當業與中藥產業中客家人壟斷的現象是如何出現的呢？張翰璧〈族群政策與客家產業：以新馬地區的典當業與中醫藥產業為例〉一文除了強調華人移民歷史與產業特性兩個分析層次外，也回到海

峽殖民政府政策的脈絡中，回答典當與中藥產業如何成為客家的獨占產業。本文使用的資料為海峽殖民地的檔案資料，從歷史與政府政策層次分析，海峽殖民地政府所採取的各種族居住的劃地分居、扶植海峽華人的經濟勢力以及引進礦工等的政策，都是間接或直接促使族群分工現象的形成。因為不同祖籍地的人群分區而居，也強化內部凝聚力並創造出網絡關係，兩種因素共同發展，看到典當業與中藥業與客家族群的高度關聯性。

林育建〈客家族群商業網絡的形成與變遷：以馬來西亞太平中藥業為例〉一文試圖探討馬來西亞北霹靂州太平地區，客家人是在怎樣的社會、政治和文化土壤，以及國際環境下鑲嵌進入中藥業？不同歷史時期（特別是馬來西亞民族國家獨立之前與之後）的馬來西亞社會（華人、非華人）的中藥觀為何？中藥業的客家人與其他方言群華人透過哪些行動，與國家、馬來西亞社會互動，影響馬來西亞社會對中藥的認同？本文雖試圖透過「關係網絡」來解釋何以馬來西亞客家人會「壟斷」中藥業，但文中較無法清楚看到當地客家中藥業的發展與整個馬來西亞社會、政治和文化，甚至是整個國際環境的關係。再者，本文希冀探討太平地區客家中藥業產業的形成與變遷過程，理應有一時間縱軸的歷程脈絡，但文中卻不見太平客家人經營中藥業的歷史縱深度。

張維安與張容嘉〈馬來西亞客家族群信仰〉一文討論馬來西亞客家人的信仰，所針對的是做為民間宗教這部分的信仰，基本上並不包括客家人的天主教、基督教等信仰

之討論。本文區分了馬來西亞客家族群三種民間宗教信仰：第一，為客家與華族共同的信仰，如觀音信仰、媽祖信仰、關聖帝君信仰、柔佛古廟；第二，為區域與客家共享的信仰，包括三山國王與潮汕地區、譚公爺與惠州客；第三，馬來西亞客家在地特有的信仰，包括砂拉越「十二公司」領袖的劉善邦廟、惠州客家人及海山黨首領的仙四師爺廟、馬來西亞特殊的大伯公信仰。

有別於張維安與張容嘉處理馬來西亞民間宗教的部分，黃子堅則著重要客家族群與基督教巴色教會的關係。在〈馬來西亞基督教巴色教會與沙巴州的客家族群〉一文中，黃子堅探討巴色教會如何塑造客家認同，透過專注於客語及客家生活方式，教會百年來在沙巴一直扮演維持客家認同的重要角色，這些都體現在教會所舉辦的各種活動，尤其是在禮拜和學校方面。不過方言差別所造成的阻礙已不再那麼重要了，教會的客家認同面臨著許多外在的變化，譬如其他方言或他國語言的使用，諷刺的是，教會的客家定位被削弱，竟是肇因於教會的成功擴張，因為此舉也將許多非客家人含納進來。

最後一篇論文是林開忠〈日常生活中的客家家庭：砂拉越石山與沙巴丹南客家家庭與日常生活〉一文。本文認為東南亞地區客家人的「客家性」並沒有因為經濟政治與歷史的發展而銷聲匿跡，無論是都會客家少數族群或鄉村客家多數群體，幾乎都可從他們的私領域或家庭日常生活中找到「客家性」的蛛絲馬跡，故本文針對客家人日常生活，選擇沙巴的丹南鎮與砂拉越的石山鎮（Batu



Niah) 進行比較深入的分析。本文發現，在客家語言的運用上，不只是客家家庭內的主要溝通語言，更由於聚落的主要共通語就是客家話，因此更強化了家庭內的語言使用。在飲食料理上，兩地客家人的食物特色都有被大眾化的趨勢，例如河婆客家人的鹹茶成爲石山地區某些小吃店的特色美食，龍川客家人的釀豆腐也成爲丹南地區家喻戶曉的美食。在文化傳承與族群認同方面，本文認爲當都會區的少數客家人的客家性必須透過各種挪用、拼湊來提倡時，鄉區客家聚落的家庭與日常生活卻是再現客家性的最後香火，透過這些私領域不斷展演的儀式或文化，讓客家人世代的身分認同得以維持下去。本文特別強調「鄉村」客家聚落對於「都會」客家族群的重要性，但筆者好奇的是，隨著「現代化」與「都市化」腳步加速，許多「鄉村」客家聚落出現年輕人外流的現象，以致於「鄉村」客家聚落逐漸萎縮，如此一來，客家認同的最後的香火「逐漸凋零」後，客家文化或認同該如何維繫或轉變，卻也是後續值得關注的現象。

## ❁ 結語

本書最大貢獻在於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，與臺灣及中國的客家研究成果進行對話，有助於描繪出東南亞客家社會的特色；不過除了強調客家區域特色比較外，也應關注當地的社會文化脈絡。

本書認爲東南亞客家顛覆了過去對於

「客家人不善經商」的印象，但這樣的推論乃經由東南亞、臺灣與原鄉客家的比較，似乎抽離了東南亞社會環境脈絡，可能無法窺見東南亞整體環境的背景因素。

本書發現東南亞客家人多從事當舖業、中藥業等事業，東南亞客家人從事商業的比例看似比臺灣及原鄉客家人多，但回到東南亞情境與其他族群進行比較，卻可發現東南亞客家人可能也是「經濟較爲弱勢」的一個族群，從本書〈錫、礦家與會館：以雪蘭莪嘉應會館和檳城嘉應會館爲例〉一文中便得到印證，利亮時提到：「客家人在檳城、馬六甲與新加坡的人口都不多，在這三地從商的客家人大部分都是小資本經營，例如開中藥店、當舖、打鐵等。……在海峽殖民地，客家人無法與擁有雄厚經濟實力的福建人競爭，而錫礦辛苦的開採工作可能引不起福建人的興趣。」(本書頁 77) 此文句透露出東南亞客家人與福建人相較，似乎沒有較佳的經濟實力。

本書諸位學者已累積不少東南亞「客家研究」成果，對「客家研究」有不少貢獻，惟在方法論上，不同客家區域比較固然可突顯各地客家聚落特色，但仍應關注當地社會文化脈絡 (context)，如此一來，客家社會發展樣貌與文化型態將更能顯現。 ISBN

## 注釋

1. 高宗熹，《客家人：東方的猶太人》(臺北：武陵出版社，1997)